



散文文体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张怡微

从创作、改编的角度来看,现代散文文体还能经历更多变化,这些变化并非偶然生成的,它诞生于社会,诞生于经济发展,诞生于复杂的当代青年文化之中。我们要理解新的文学现象,需要深化对跨学科视域下当代人新的生存处境的理解。好的文学,诞生于复杂。在万变中,又有不变,永恒的价值才是文学的根本所在

有意思的。”在此之前,好像从未有人系统地讨论到散文的段落秩序,及其句子生成和组合的逻辑。大家似乎都很相信散文家的艺术感觉,反而不去讨论它精确的结构和指向,也没有人关注到经由错落延伸的“误读”,对于我们理解散文之美的具体影响。就好像,李娟散文带给我们的那种整体的情感体验仿佛绘画一般,从哪里开始看,看到哪里,重点看哪里,再看一遍又看到了哪里,并不是我们印象中记叙文的线性逻辑。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审美方式,其实也为机械复制时代提供了技术上的便捷。我们认同一个散文家,更趋近于先认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写作的状态和场景。散文家更有必要向读者展示整体艺术生活锚定的土壤。

作家刘亮程的小说目录也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他的目录本身就是一篇文章,或自成一首散文诗的意义,这是精心设计的成果。举《虚土》的目录为例:

开头 我居住的村庄/壹 我五岁时的早晨/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五岁的早晨/我不长大行吗/贰 一个人要出生/一个人要死/一个人出生/一朵云/烧荒/……

小说到底是从正文第一段开始的,还是从目录就已经开始了?小说到底是从诗的文字揭开序幕的,还是诗只是闲置的装饰?这让我想到写过《现代散文现象论》《现代散文构成论》《现代散文类型论》《现代散文纵横论》的郑明丽,她曾经明确地提到过文体之间的复杂交流,是现代散文形成的开端。她认为,清末沈复、刘鹗等作家写下自传式的散文,不但承袭了晚明小品的写作风格,也启发了民国时期新散文的生机。

沈复的《浮生六记》与刘鹗的《老残游记》,虽然被许多学者划入古典小说的范畴,但他们其实也是成功的传记式散文,尤其是在白话语言上提供了最直接的样式。其中,《老残游记》又别具山水游记的特质。两者结构的松散与作者个人意见的突出、性格之呈现都是属于散文的体例,而不像小说。它们是现代散文兴起前夕的过渡时期的产物。白话语言最直接的样式,个人意见的突出、结构的松散可能成为李娟散文后现代结构编码的别致属性。

一百多年过去了,艺术家仍然在两种文本中穿梭,试图打破边界、打破死板,在看似没有缝隙的结构空间中灵活地编排溢出的意义。我猜想,艺术家对于文体的辨识,肯定和批评家、学者是不一样的。学者是历史的后见之明,作家则觉得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至于为什么应该,他不负责去解释。这是我目下所看到的散文文体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散文虽然很难教,但依然有人在写散文,依然有人在读散文,依然有新的变化发生、新的意义生成。在更大众的领域,如澎湃“镜相”举办多年的“非虚构写作大赛”和2024年秋季小红书举办的首届“身边写作大赛”,都是散文的征文类竞赛。作为评委,

我可以看到参与人数之多、题材之丰富,甚至会超过圈内评奖类竞赛所涉及的选题范围。例如,我在“身边写作大赛”中看到过有在自闭症商业机构工作的特教老师,写出自己在道德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彷徨和挣扎;又如有一位失业的雅思老师写到自己在英国帮忙做代购的经历,这些内容也很难成为传统散文的关注对象。这些传统期刊看不太上的“当代生活”,在社交媒体却有很好的阅读量,因为它们拥有别致的生活场景,这种生活场景为创作的真实提供了依傍。如果说这些新媒体写作可以形成散文的“新类别”,那它的书写本质还是基于不断更新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

以上是我在创意写作学科内,有关现代散文方向的大致观察。

在现场,重新理解“什么是好的散文”

其实我并不十分专业,我唯一的观察优势是始终在课堂一线,也在青年散文创作的现场。有趣的是,在我投入这项工作的短短8年中,外部社会与文学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我们和“00后”学生一起重新理解“什么是好的散文”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9年时,学者陈思和曾组织过一次讨论,讨论涉及很多话题,其中与我有关的就是希望能编选一部1949—2019年的当代散文选,可以直接当作教材来用。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无论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都不必如此直接地拷问自己对于遴选他人作品的标准,但是编文选就需要非常清晰、坚定地为作品分类,并且能够说清楚自己的散文观。这个标准,需要许多细致的考量,具体到字数、筛选篇目的准则,还有选篇是否需要考虑到文学史的标准来保留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等。后来,战玉冰在上“散文经典细读”课程的时候,就更多依据的是现当代文学史的逻辑。当时,以我的学术资历及工作仅两年的教学经验,其实是很难胜任这个任务的。然而,这个最终只做了一稿且没有下文的工作,却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我很认真地阅读了包括郁达夫、周作人、郑明丽、林非、杨牧、王安忆、黄锦树、张新颖、周芬伶、高嘉谦、杨佳娴、向阳等散文选导言及文论等,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年年选和台湾《九歌年度散文选》等,揣测主编者选篇决策背后的思维方式,这个过程给了我更多时间去思考关于散文的问题。

后来我也将它布置给了每一届选修“散文写作实践”课程的学生,让他们做一个课堂报告。报告的题目就是: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选一个自己心中的理想散文选。我们知道,喜欢单篇文章、单个作者是很常见的、很容易的,比如有的人喜欢李娟的《木耳》,有的人喜欢白先勇的《树犹如此》,有的人喜欢王安忆的《今夜星光灿烂》,但这都不足以

撑起一个所谓的“散文观”,不足以撑起一个可被言说、且说服他人的标准。我猜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让更年轻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审美去选篇、去分类,顺便也把我的困难分担出去,听听大家的意见。同学们交出了较为理想的选篇范例,也反映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也许,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变化,游记或者说生态探险文学与散文文体的联结变得更加紧密了。例如,有同学提交的选篇包括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傅菲的《灵兽之语》、阿来的《嘉绒记之一》等,还有一些外国作家,如东山魁夷的《一个人的风景》、J.A.贝克的《游隼》、罗伯特·麦克法伦的《深时之旅》等。这些选篇清晰地呈现了选者对于文体与散文物质性的看法,体现了选者心中认为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进入到散文文体的观照范围,世俗生活显然不在其中,或者说,不占据首要的位置。还有同学提供了青年作家杜梨的《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亲鸟——孕期观鸟笔记》,为此,我们一起讨论到了2019年以来英语文学的新题目:喜鹊回忆录。我举了两本新引进的英国散文为例,它们都有中文版引进一本是弗里达·休斯的《喜鹊乔治》,另一本是查理·吉尔莫的《飞羽:关于两个父亲和一只喜鹊的回忆》。前者讲述了女作家在经历母亲去世、父亲重组家庭后,如何在生活某一阶段“偶遇并养育”了一只喜鹊乔治,并由此展开一段复杂、治愈性的共生关系旅程。作家以日记散文的形式,带领读者慢慢将这个看似荒唐的人生抉择以心灵旅程的方式加以呈现。和传统印象中的日记文体不同,作品中虽然有具体的日期,但本质上更像一部共生生活史,一部关于人类与喜鹊家庭关系的回忆录。换句话说,日常生活在散文文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与女作家在自己的房间里填入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一精神层面上形成了镜相关系。另一部也是一部情感回忆录,讲述了男作家在养育一只喜鹊的过程中,对“父亲”这个角色的重新理解,由此回望作家与生父之间的复杂关系。修复亲子关系要通过两只喜鹊的生活经验来慢慢桥接。在这里,“喜鹊”不是客体,而是重要的、与人类共生、完善情感联结的媒介。人观察鸟,是旧题材。人与鸟共生,则是近年来国内外散文作品的新发明,背后隐藏着人类与他者、与自然的精神关系。

我猜想,从创作、改编的角度来看,现代散文文体还能经历更多变化,这些变化并非偶然生成的,它诞生于社会,诞生于经济发展,诞生于复杂的当代青年文化之中。我们要理解新的文学现象,需要深化对跨学科视域下当代人生存处境的理解。好的文学,诞生于复杂。在万变中,又有不变,永恒的价值才是文学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课题“跨学科视域下的创意写作本土化研究(2009—2024)24CZW103”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田华等艺术家的回信中,将“经典”摆在第一位,随后加上“热爱”“坚守”,用简简单单的三个词、六个字,标示出文学艺术工作的正确途径,再辅以“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一下子就将文学艺术的灵魂与精髓说得清清楚楚。

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只有书本知识的积累,走不到“经典”所要求的位置。就文学创作来说,讲究的是沉淀和积累,而且必须是生活层面上的,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扎根生活沃土”。

1846年,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街头亲眼看见一个男人因为偷一块面包,而被警察抓起来处以酷刑。到了1862年,雨果才以此为原型写成世界文学名著《悲惨世界》。书中的主要人物冉·阿让,因为偷一块面包给外甥吃,被判处19年苦役,在如此悲惨的世界里,雨果所要表达的是这个世界的悲惨吗?答案是否定的。雨果真正关心的是通过妓女芳汀的悲苦,警察沙威的冷血,商人德纳第的无耻,最终表现养女柯赛特所象征的人性之美。按照俗世的眼光,《悲惨世界》有明显“说教”意味,类似这样的“说教”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时常能够看见。那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写作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破绽,但在文学中,通过人生细微区别,表达生命不朽与人性伟大,这种境界是非常了不起的。冉·阿让因为偷了一片面包被判了19年重刑,出狱之后,警察沙威还一直盯着不放,将冉·阿让逼得走投无路。像沙威这种十恶不赦的人,最后却被冉·阿让感化了。还有女神一样的珂赛特,才觉得文学中一定要有这样的。文学的境界,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一定要从人道主义出发,表现出高于原始生活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烛光,是人和人类的希望所在。假如每天看的都是一地鸡毛,文学也是一地鸡毛,那我们需要文学干什么?人民不抛弃这样的文学是不可能的。

“讴歌时代精神”不是泛泛而谈的概念,是有迹可循、有据可查的鲜活的存在。

10年前,我写《蟠虺》(青铜器三部曲之一)时,通过对曾侯乙尊盘的制造工艺到底是范铸法还是失蜡法的追问,描写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体现了中国社会达到新的文明高度后,从知识分子到普通人在文化性格上的升华与跃进、自省与反思。2024年出版的《听漏》(青铜器三部曲之二),写的依然是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真实的九鼎七簋等青铜重器,用“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的叙事方式,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传统理念,从貌似故纸堆的陈词滥调中发现和发掘出属于新世纪人们的时代精神。从“两周”时期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提到湖北,人们总会下意识地说:“楚人好巫。”楚人好巫的“巫”,一般人理解为是装神弄鬼的巫术。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巫”是古人对自身所处时期最高科技水准的认知,也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在青铜冶炼与制作上,好“巫”的楚人足以傲视群雄。楚人喜好的“巫”还包括最高水准的艺术,曾侯乙编钟是音乐史上的奇迹,秦晋齐鲁等地的编钟,能发出洪亮的钟声,却不是美妙的音乐。从普通的钟声,到非凡的音乐,中间存在一道巨大的科技鸿沟。曾侯乙尊盘可以说是雕塑艺术上的奇迹,上面复杂得让人看不清的透空蟠虺纹,毫无疑问是当年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准。楚人好细腰,春秋五霸中的另外四霸、战国七雄中的另外六雄都不理解,纤纤细腰有什么好处?耕种渔猎、沙场点兵,细腰看上去就比膀大腰圆的人弱小许多。细腰的艺术魅力,却是千百年来最美的诗性。生长在楚国原野上的先进科学与独特文化,更是造就世界文化巨匠屈原的主要原因。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最基本的要素是传承。

无论是创造还是传承,都是为了像总书记所说,更好和更有效地“抒发人民心声”。

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作品以白描手法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过程。据统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小二黑结婚》是改编为戏剧较多的小说。这样一部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仅仅从自由恋爱的角度来认识是够不上“时代精神”和“人民心声”的。1940年代的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建的落后状态,旧式包办婚姻依旧是社会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旦实现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势必冲破半封建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改变,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的社会面貌。这一点才是这部小说的经典意义所在。赵树理还有一部小说《三里湾》,在整个1950年代影响巨大。一个社会只要发生变化,一定会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体现出来。《三里湾》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的一段场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塞珍珠描写苏皖一带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中,当时的中国乡村,除了绝望还是绝望、除了罪恶还是罪恶,整个中国大陆上没有一处不是丑陋。实际上,在对旧中国恨铁不成钢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也基本上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在哪里。而赵树理的《三里湾》则较早写出了中国乡村的朝气蓬勃,写出了人人对前途与未来充满理想和信念,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真情实感以及前所未有的内心。

真正伟大的作品,是没有时空限制,可以连接过去和未来。

近几个月,我跑了不少考古现场,为“青铜器三部曲之三”的创作进行专业上的准备。总书记对8位老艺术家的回信,也可以说是对文艺工作达到新的高度、文学艺术创作出现新的伟大作品的激励。作为一名文学界人士,我内心的触动非常强烈。希望自己能将这种触动化为特殊的能力,尽快开始新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作者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伟大的作品没有时空限制

□ 刘醒龙

《西湖》《民族文学》《万松浦》《芒种》《浙江作家》:

文学如何书写现代化进程下的城乡图景

□李丹瑜

在高度社会化、数字化的宏大社会结构中精神“存在感”的缺失。现代青年的精神困境没有简单的解药,真正的出路或许在于以积极的心理状态勇敢直面虚无、反抗失望的过程。

杨小玲的《桃花水母》(《浙江作家》2025年第3期)里,通过相亲结婚的苏小前和李光明之间少有交流。苏小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珍爱自己的女儿稚稚,并不特别在乎李光明是否是一名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但当女儿患病去世后,苏小前的生活平衡被完全打破,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甚至将肚子里的畸胎瘤当成自己的女儿,变得精神失常,迷失在身份认同的泥沼中。闵芝萍的《双下山》(《西湖》2025年第5期)里,女主角拒绝被婚姻契约定义,男主角放弃艺术理想落入俗套的生活轨迹,以及他们关于名字的讨论,都指向关于“我是谁”的追问。“上山的路只有这一条”隐喻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判断标准,主角们在爬山过程中的交谈、迷茫、试探和共鸣,体现出他们对情感复杂性的体悟和对简单人生剧本的反思。胡安焉在《夜泳》(《西湖》2025年第5期)中通过看似平淡的日常叙述,展现了一次不断向内蔓延的、自省式的精神探索。“我”的内心在不断对规则做出考量和判断。结局的“夜泳”代表

着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坚持,也代表着渺小个体在庞大世界中的处世姿态。

在现代化高速运转的当下,是否还存在一种纯粹、坚韧的人性力量,能够穿透层层迷雾?作道的《不速之客》(《民族文学》2025年第5期)与王华的《康复》(《万松浦》2025年第3期)为我们照亮了这种可能。《不速之客》里来讨债的韩春苗有着与现代都市格格不入的质朴与善良,她讨债时采用的“笨办法”唤醒了韩成元潜藏的良知,她最终能讨债成功,表明在冷峻的规则体系之外,还有更基本的人情和道义需要被看见。《康复》里的吕正午作为康复村里唯一的医生,有一种超越职业、近乎神圣的责任感与人道关怀。他与麻风病人赵大祥、朱迎香都对这个康复村有着“家”的归属感,他们的坚守与尊严是对单一价值标准最沉静也最有力的反思。

现代化进程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更应通过文学的话语去引发关于“何为进步?何为人性?何为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现代化要把人的心灵带向何方?”等问题的根本性反思,这些问题或许是这个时代最需聆听也最难回答的。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显著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其引发的结构性变革也深度渗透至文化生态与个体精神层面。在《西湖》《民族文学》《万松浦》《芒种》《浙江作家》等文学刊物的近期新作中都可以观察到现代化进程对城市与乡镇带来的不同变化。

在乡镇场域,现代化浪潮深刻影响着地域性生态平衡与乡土文化传统。张道德《银杏树下》(《芒种》2025年第6期)里的宝山公司为了攫取资源利益对龙牙山进行无节制的矿产开采,带来山体疮痍、水源污染、粉尘飞扬等严重的环境破坏。覃姜华《布柳》(《民族文学》2025年第5期)中的巴定村在积极进行油茶产业转型的同时,也面临“桉树种植与水源争夺”的困境。当“杉木耗水量大”成为砍伐理由时,乡村产业转型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改良,而是对土地生态平衡方式的重构。传统技艺、伦理与信仰体系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万松浦》2025年第3期中艾玛的《槌不离几》与晓苏的《铁匠世家》共同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技艺与伦理根基的蜕变。机械化生产使得效率翻倍,无论是木匠的风箱还是铁匠的铁器,许多传统技艺方式都在现代性标准的冲击下与身体经验和个人智慧逐渐疏离,新一代传